

天堂的神話
是怎樣破滅的

曾彥修 著

书名题字 王以铸

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

(上册)

曾彦修
著

概 述

(一)

我以衰败之年,即 1985—2008 年夏秋,写成这两本小册(即我 65—90 岁之间),当然无异于自寻早死。但《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真的,九十岁已过,求什么?但多少年来,对苏联溃败这一历史重大事件,总有不少人说成它是由于未能坚持斯大林伟大红旗的结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就早有定论,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此一趋势,似乎日益扩大。那怎么办呢?回到斯大林时代去吗?我关心苏联的事,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起,即十一二岁时开始。这并不是胡吹的神话。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中国,即使在很僻远的山区里,也往往会有一小批或二三个关心苏联事情的青年。这些人的共同特点,当然是从改变中国的极贫弱状态出发,而认为苏联的道路是全人类获救(当时没有“解放”一词)的唯一道路。遗憾的是,历史的发展并未如此。

那里几十年的种种措施,使他们的崩溃成为难于避免。即使不是戈尔巴乔夫当政,而是由那个两个多月前的 1991 年 8 月 19 日发动政变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的“内务部长”普戈当政,恐怕大趋势也改变不了。因为那个政变只存在了三天,一切武装,包括“最可靠”的“阿尔发”特种武装,都一致拒绝“镇反”。普戈本人大失所望,也在 8 月 21 日自杀。历史不是没有试验过:用恢复斯大林的办法并未能挽救他们的国家!

苏联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在无人公开出面反对的情况下崩溃,我以为根本的原因只有四个字:政酷民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这个唯一标准,不能到了斯大林又例外了。

本书上册写的是“苏联思想专制史略”,下册写的是肃反、战争、经济等几个问题。

我之坚持写成此书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受了于光远同志的鼓励。他的信任使我不便退却。此事起源于 1980 年有关出版工作的一个座谈会上,主持者是出版局长陈翰伯,参加者有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中央编译局负责人王惠德等,我也列坐其中。我说起,几十年来我们真可怜,从三十年代以来,我们一般人自愿或强迫学的,哪里是马克思本人的东西呢,三十年代初以来,全国的左翼人氏包括左翼学生,几乎全都是读的日丹诺夫以及米汀、尤金的东西呀!想想看,哪样不是日丹诺夫的:哲学、文学、国际关

系、南斯拉夫、“世界主义”……尤其是1933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二战后全面的乱打棍子等等，其源都在日丹诺夫（当然，又均是出自斯大林，或必须经他的批准）。原则上全是一味的“左”。我说，最好能够真实地写出一本破除迷信的日丹诺夫评传其实也就是斯大林的评传。于光远说，你就写吧。

我当然是指别人写，因为我不习俄文。但据我所知，于是不会讽刺人的，他这么说，就表示他真有这个意思。因为，多掌握资料固然重要，但如何走出羁绊敢于去探求一下史实真相的态度和方法，更加重要。而我已经表明，不准备老调重弹了。二十多年来，于的这句话是我未敢放弃此事的重要动因。“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我虽未诺什么，但也没有明白推辞，一种精神上的责任感，自然而然的就承担上了。于则认为我似乎已默认要作此事了，因此，以后每次碰到于，他都要问我写的怎么样了，我均无辞以对。直到2006年他住医院我去看他时，时间很短，他仍问我：“你的日丹诺夫怎样了？”我因尚未打印完毕，仍无言以对，只好应付过去，这次我更是感愧无地。他九十岁已过，我也快到九十岁，要成空炮了。

但是，“意识形态”问题最为烫手，一碰就是“帝修反”。而曾经四五十年经过这个过程如我者，具体的顾虑，当然就更多一些。

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坚持日丹诺夫，这不是活见鬼

吗？但是，如果你不认真按照史实去了解苏联几十年的思想专制和它的沿革是怎么回事，你也就根本不会知道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了。了解真相是认识苏联的入门。

中国以后要永远坚持“以人为本”的立国思想，而苏联则恰好相反，那里是以人为末，民命不如草芥。我这话能乱说吗？看完了本书后，自可作判断，所谓的维辛斯基的“法学”就是这么个东西。

从1980年于光远那么讲起后，我就试着去干，不计岁月。

(二)

近九十年来(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左翼思想在国内暂占优势算起)，中国的西方民主、自由、天赋人权等思想，可谓由削弱以至到完全非法了。中国几千年的民族文化思想也遭受了几乎全同的命运。实际自上世纪1954年批判胡适起，就已形成这个局面了。1958年“大跃进”的所谓“一穷二白”是什么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在世界文化思想史上如果从纪元前几百年算起的话，至今还能比较完整地双峰并立的，恐怕就是古希腊文化和中华文化吧？中华几千年深厚、多姿、优美的文化，如何一下就变成“白”了呢，鲁迅是说过“扫荡这食人者，掀掉这厨房”，

至今声若宏钟,但他只是说要揭发,批判这个长久文化中消极的吃人的部份(可惜现又一切不分,均成了神圣与优秀的了。)。这说法是没有现在那些以否定、抹煞、挖苦鲁迅为时髦的一些人所说的那么罪恶的。其实,胡适也多少有过这样的思想。他引用和强调过清代十八世纪时大思想家戴震责备明清两代有些理学家是“以理杀人”,引用过“以‘法’杀人者犹有人怜之;以‘理’杀人者其谁怜之”这样杰出的反对思想箝制者的话。所以,中国思想史上的消极、愚民、杀人部份是有的,也相当严重,宋元明清以来更突出和严重。

这就是说,对古代及近古的中国思想史,我们应该有两个任务,一是继承、发扬;二是批判、抛弃。

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马克思主义来了,一下起了空前的革命作用。这个思想基本上是从苏联间接传来的。但它在中国起了根本革命的作用,它的无可比拟的伟大历史功劳:是把中国起死回生了!这当然是根本的伟大历史作用。

近七十年的中国,思想界固然受到了苏联来的思想的很大鼓舞,并在实践中起过伟大历史革命作用;但它也同时破坏了世界几百年来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伟大传统,及中国几千年固有的某些优良的文化传统,主要指其中优秀的“民本”、“民贵君轻”、“仁民”(即爱民)等伟大仁爱思想,而在几十年中被“一帚扫而光”,相当彻

底地改以“斗争哲学”来决定一切。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几十年的“斗争哲学”所带来的是些什么后果，是大家都清楚的：一个民族的灵魂被彻底改造了，几十年地被斯大林、日丹诺夫的一套彻底改造了。如果我说的全是谬论，那么请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专家出来证明一下：看看哪些是出自马克思，而不是直接出自斯大林、日丹诺夫、维辛斯基，以至米汀、尤金的？如果我说的全是造谣，就请拿出事实来反驳就是。我却可以举出实例，在1938年以前，中国只有过以“右枢、玉铭”（听说是侯外庐、王思华两位老马克思主义者）合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一部分，但有几个人知道这本书？其他如郑超麟以“林超真”笔名，杜国庠以“林伯修”笔名（以上均凭三十年代初的记忆，可能不确。）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小型著作，发行量很小，远非一般革命知识分子所能体会。至于说陈望道前辈译印过《共产党宣言》，解放前有谁听说过，当然更得不到了。真正在中国三十年代上半期起过一些革命作用的是译自日文的河上肇的《通俗资本论》。所以，历史事实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说，开始时有点来自苏联的德波林，绝大多数还是日丹诺夫及其手下一些人的、经过改造了的“马克思主义”。

现在是到了我们这个民族不能不慎思明辨的时候了：他们这一套已在多国、也在中国被证明过，今后是绝不能用了。我们要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伟大理想，而不

是斯大林—日丹诺夫的“发展”。要发展我们自己发展，万万不能要斯大林的那些发展。

我们这个民族在经济与自卫能力上，现在已经大大上升了。但整个民族的主流意识，似乎就是不准站起来，有人就始终要以做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思想体系附庸为荣。这叫什么独立自主呢？没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卓然独立，其他的自强独立，都谈不上；你这民族的脊梁骨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我们要讲国际主义，不要只坚持民族主义，但是我们如果老以人家的民族主义来当国际主义，那就叫认错祖宗了，冤枉不冤枉？斯大林根本上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你却硬把它当作国际主义，现在还不清楚么？

(三)

在多年的摸索中，我遇到了很多大难题，例如生物遗传学上的李森科新生物学问题；中国开国后多年赖以立法的“维辛斯基法学”问题等，我怕啃不动，曾想放弃不谈。后来终于弄清了，那里丝毫也没有真正生物学与法学问题在内，我还是拼老命勉力去弄清了那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一句话，其中什么生物学与法学也没有，一点也没有，有的只是蛮横无理的、残酷的政治镇压！要弄懂它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生物学与法学知识——它们根本就没有谈生物

学与法学,谈的只是“阶级斗争”与加强镇压的问题。

苏联在战后几年,即1947—1951年的几年中,还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物理、化学、计算科学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反对欧美近几十年来最新科学成果的广泛批判。这些方面,我因无知,一字不敢涉及。

在人文科学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批判,我因未摸过,也一字未敢涉及。例如,战后对苏联长期任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瓦尔加也批判了,机构解散了,人也撤职了。根本原因是瓦尔加认为战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有了变化,不一定会定期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了,与斯大林见解不同。事实证明瓦尔加比较对。类此,须要专业知识较多,我自不敢接触。

因此,总的说来,我在本书上册共二十二节中指出的仍只是局部的东西,战后苏联全面反对西方科学成就的范围远比本小册中举出的多得多,大得多。我听说过,1948年8月在批判和消灭遗传学之后,下一步就是大规模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物理学大批判了。据说,负责制造原子弹的贝利亚知道此事后,就去向主持这项制造的首席专家库尔恰托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为此人专写了一章),该科学家提出,批了那个东西,我们就得全部停工入狱了。此事应该不是传说,我在后文中会要多少提到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那本很详细的《苏联哲学纪事》译本中,就相当详细地报道过在苏高教部的领导下,已经正

式开过对此事的多次中型批判会了，因贝利亚的这一反映，斯大林才决定煞车了。从此对西方自然科学的批判火势，才慢慢的缩小下来。算好，斯大林在这件事情上慢慢转过弯来，轻轻巧巧，不知不觉，他在 1951 年令人莫名其妙地发表了一大篇什么关于“语言”学的文章，说语言是“基础”，不是什么“上层建筑”，没有阶级性。自然全国又得一致转来歌颂他的“语言学”文章了。于是，领袖轻轻一转舵，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自然科学运动自然就不知不觉的慢慢刹下车来了。（中国大量留学生去苏的时候，这个大批判高潮正渐渐低了下来。）。当然，这绝不是说苏联科学没有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而是说，如果没有本书所述严重的政治破坏和干扰的话，苏联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们的成就，肯定会光辉的不可比拟。

十九世纪他们的一流与超一流的文学家之多，之杰出，不就是人类史上的空前奇观么？那些大师们是要与但汀、莎士比亚一样地永存于世的。他们现在仍奇才倍出，一个撑杆跳女王一跃过 5.16 米，令全世界人眼看见了也还不敢相信，太奇了，似乎没有什么高峰他们不可攀过似的！

(四)

俄罗斯首先是由于痛惜国际地位的降低,今后要大力恢复斯大林的权威地位,势在必然。其强烈程度,也是无法估料的,这首先是任何一个强力执政者都十分需要的事情。但我估计它的范围大约也限于国内及卫国战争,而不会涉及“世界革命”的。中国再不能不清醒一点了:我们今天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坚持学苏联道路得来的,还是坚持挣脱那一套得来的?

俄罗斯今后的道路会不会又由“前苏联”变成“后苏联”呢?有不少人认为似乎只有这样才是唯一的出路。多少年来暗含此意的人甚多,借箸代筹:唯一的办法是光复旧物,多少去其太甚即可。而在他们国内,不论顶尖层或最下层,不少人的态度也非常明确。2007年12月6日美联社莫斯科电说,俄罗斯有些史学家早已在编写一百卷的俄罗斯全史,有的史学家发表谈话,主张应该揭露一点斯大林时代的一些镇压行为。但该消息又说:“6月份,普京告诉历史教师,尽管斯大林的政治清洗是苏联时代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但俄罗斯人不应为此内疚,”因为“其他国家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这话是什么意思,不必画蛇添足了。莫洛托夫在他的《访谈录》中,对苏联的“肃

反”，也大为不满，他说太不够了，指名李维诺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这些人没有杀，太宽大无边了，他为此向人民道歉(!)。

但现任总统麦德维杰夫语气则又相当不同。俄新社2009年10月30日莫斯科电中说，“他(麦德维杰夫)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波及范围之广令人难以想像，全国民众都深受其害，一些社会阶层被整个摧毁，数百万人因政治恐怖和虚假指控而丧生。”这里，麦德维杰夫至少承认了有“数百万人”是枉杀的(“数百万人”，在中国一直被看做是一件不值一提的“扩大化”三字，或者根本就可不提的没事。)在这则电讯中，报道麦德维杰夫总统还说：“两年前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显示，部分年轻人甚至不记得任何在大清洗中遇害的著名人物，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年轻人应当克服冷漠，不能忘记历史的悲剧。”(《参考消息》2009年10月3日)麦德维杰夫总统说的是“全国人民都深受其害”，这同普京二人当然是各唱各的调了。麦氏的这个说法同赫鲁晓夫的说法又有什么原则的不同呢？赫氏说了一点点最上层仅仅限于斯系人物的被镇压为不可了解，至于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勃留赫尔、叶高洛夫三大元帅等被杀事，赫氏连一个字也未提，更不敢说什么“祸及全国”了。

现在，相当明显的趋势是：前一种说法与取向已占绝对优势，将来则可能取代一切。这不是三天的“8·19”，

而可能是数十年以上的“8·19”救国运动。这不必奇怪，一般，一个历史钉子是很难或根本不可能把人碰回头的，往往要连续碰了几个或无数个钉子之后，才可能使人回头。德、日已有先例。二战后，美国有了朝战、越战、伊拉克战、阿富汗战之苦，包打天下打不了，以后回不回头呢？碰钉子要碰到根本没有任何力量再碰的时候，才有可能不再去碰同样的钉子了。此事证诸近一百几十年的若干大国的历史，无不如此。俄国要回头走点老路，几乎是重复若干大国的历史。这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往往要几十年才能看出一点结果来。

所以，对俄罗斯的未来，极力推行极权也好，恢复斯大林时代的光明也好，都不必奇怪，甚至是不可免的。但世界历史不是朝着个人极权的方向发展，总是不可怀疑的——虽然它在不少地方还不知道要存在与发展多少年。要大家都走和谐、民主、繁荣、绿色的道路，在本世纪的上半世纪看来是毫无可能的，本世纪的下半世纪，对此是不是有点眉目，成为全世界共同的倾向呢，这是难于预料的。我估计如有此种倾向出现，那就太好了。

* * *

我们实在不能再走老路了。只有以史为鉴，才能观其得失。

我必须说一句，我确实是浅陋无识的，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有二十二年不能看小“参考消息”，丧失了点滴世

界知识的来源。我 1979 年无意中听人谈起,美国人于 1969 年登上了月球,大为吃惊。因此,我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这只是点粗陋之作,至于专家之作,有待他人。

鲁迅云:“常识家之言多浅;专门家之言多悖。”(大意)我当然是“浅”,想“悖”也“悖”不起来。

是为概述。

2009 年 9 月 20 日(于朝阳医院中)